

从亲属词分类看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肖二平^{1,2} 张积家²

(¹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杭州 310036) (²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摘要 亲属关系基于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形成, 是个体首属的社会关系, 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王冠”。在每种语言中, 都有表征亲属关系的词, 即亲属词。亲属词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社会和文化的信息, 是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01 年以来, 通过一系列对汉族大学生、汉族儿童及青少年、纳西族、摩梭人、傣族、基诺族、彝族和白族的亲属词分类研究, 发现了不同民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揭示了影响亲属词分类的因素, 显示了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揭示了语言影响亲属词分类的机制, 为语言影响认知的理论提供了重要证据; 揭示了不同民族的亲属关系的特点, 为民族心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料。

关键词 亲属词; 民族语言; 民族心理; 概念结构; Sapir-Whorf 假设
分类号 B842; B849:C91

亲属关系基于血缘和婚姻形成, 是个体首属的社会关系。人类学发端于亲属关系研究, 亲属关系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王冠”。在任何语言中, 都有表征亲属关系的词, 即亲属词。亲属词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社会和文化信息。它如同一张显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网的图表, 将一个社会的整体分门别类地显示出来。恩格斯(1884/1972)指出: “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 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 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因此, 亲属词是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 亲属词的研究现状

1.1 亲属称谓分类: 人类学的研究

最早研究亲属词的是人类学家。人类学主要

关心亲属的分类。人类亲属分类的最基本原则是从生物学的事实出发。一个人的亲属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1)血亲。由出生决定, 亲属之间有血缘关系。如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祖父母所有的子女以及这些子女的子女等。(2)姻亲。由婚姻产生, 包括一个人的配偶及其一切亲戚。如果将血亲和姻亲中的一切亲属都加起来, 一个人的亲属将非常众多。所以, 在任何社会中, 人们都没有必要将这些亲属各自使用一个称呼, 而是把亲属分成若干类, 每一类用一个称呼去概括。因此, 所有的亲属称谓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类分的性质(董恩正, 1998)。

克罗伯(Kroeber, 1909)在《亲属关系的分类系统》一文中, 系统地提出了划分亲属关系的 8 项原则, 基本上概括了人类各种社会确定亲属的标准。这 8 项原则是: (1)辈分: 不同辈的亲属采用不同的称呼; (2)年龄: 对不同年龄的同一类亲属采用不同的称呼; (3)直系旁系有别: 直系亲属是指直接的先人和后裔, 旁系亲属是指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通过一个中介亲属发生关系; (4)性别: 用不同的称呼来区别不同性别的亲属, 如父和母, 弟和妹; (5)称呼者本身的性别: 对同一被称呼者, 因称呼者的性别不同采用不同的称呼。如北美纳瓦赫印第安人中, 男子叫他的儿子是一种

收稿日期: 2012-02-15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摩梭人亲属关系的心理学研究”(10BSH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摩梭人害羞文化的心理机制”(12YJC8500 23)资助。

通讯作者: 张积家, E-mail: zhangjj@scnu.edu.cn

称呼,他的妻子叫儿子则是另外一种称呼;(6)中介亲属的性别差异:由于中介亲属的性别不同,通过他(或她)而发生关系的那个亲属的称呼也不同。如汉族将父亲的兄弟的子女称为“堂表兄弟姐妹”,将父亲姊妹的子女称为“姑表兄弟姐妹”,将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称为“舅表兄弟姐妹”,将母亲的姐妹的子女称为“姨表兄弟姐妹”;(7)婚姻:对于姻亲给予与血亲不同的称呼。如汉族人女婿称妻子的父亲为“岳父”,称妻子的母亲为“岳母”,媳妇称丈夫的父亲为“公爹”,称丈夫的母亲为“婆婆”;(8)亲属关系人的存殁:如汉族人称逝去的亲属时往往在亲属名称前加上“先”。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学中出现了不同的亲属词分类法。

摩尔根(Morgan, 1877/1995)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和田野调查,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进化理论。他将亲属称谓制度分为2种类型:(1)类别式:将亲属称谓区分为若干范畴,不加以说明,不计亲疏远近,凡属于同一范畴的人使用同一亲属称谓,这种称谓制度反映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亲属关系。(2)说明式:对亲属或者用基本称谓来说明,或者将基本称谓结合起来说明,使每个人与自身的亲属关系都各不相同,这种称谓制度反映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属关系。罗维(Lowie, 1920/1987)在《初民社会》中将亲属称谓分为4种类型:(1)世辈型:把旁系亲属称谓依照辈分全部纳入直系亲属称谓中,如父之同辈谓之父,母之同辈谓之母。(2)二分合并型:把旁系亲属称谓一分为二,与父母同性别的纳入直系亲属称谓中,如父之兄弟与父同称为“父”,母之姐妹与母同称为“母”;与父母异性别的纳入旁系亲属称谓中,如父之姐妹或母之兄弟与父或母称谓不同。(3)二分旁系型:将旁系亲属称谓一分为二,但都和直系亲属称谓有区别,如汉族人将父之兄弟称为“伯”、“叔”,父之姐妹称为“姑”,将母之兄弟称为“舅”,母之姐妹称为“姨”。(4)直系型:把直系亲属称谓和旁系亲属称谓分别异称,但旁系的同辈亲属称谓不复区别,如美国人的父母之称仅限于生己者,父母之兄弟与父母同辈异系,一律称为“uncle”,父母之姐妹与父母同辈异系,一律称为“aunt”。

默多克(Murdock, 1949)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多种文化的比较,归纳出6种亲属称谓制度,较多地得到了各国学者的承认。这种分类法的每一

类都以使用该制度的某一民族来命名。这6种亲属称谓制度是:(1)奥玛哈式:因为北美的奥玛哈印第安人部落而得名,通常与父系继嗣的社会相联系。该称谓制将亲属分成父系和母系,仅注意父方亲属的代际区别,忽视母方亲属的代际区别。在母系亲属中,母、母之姐妹、母之兄弟之女均使用同一称呼,与此对应,母系亲属中任何一辈的男性成员称呼也一样。在使用这种称谓制度的社会中,父方的亲属集团是个体所在的集团,亲属之间关系密切,不同辈分的人对待个体的态度亦不同。父亲对于个体负有保护、教养的责任,个体对于父辈亦服从、尊敬;同辈兄弟之间具有很深的情谊。母方亲属与个体不属于同一集团,关系疏远,因而就无区分的必要。(2)克罗式:因为北美的另一印第安人部落而得名,是奥玛哈亲属制的镜像反映,反映母系的继嗣制度。该称谓制注意母方亲属的代际区别,母方的亲属绝不混淆辈分,母和母之姐妹称谓相同,母亲姐妹的子女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忽视父方亲属的代际区别,父方亲属不分辈分,父、父之兄弟、父之姐妹之子的称谓相同。(3)易洛魁式:因北美易洛魁印第安部落而得名。区分父系和母系,但称谓不同——对父母辈亲属称谓分别与奥玛哈式和克罗式相同,在同辈亲属中,区分交表亲(父亲的姐妹的子女和母亲的兄弟的子女与个体是交表兄弟姐妹或交表亲)与平表亲(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与母亲姐妹的子女),平表亲比交表亲更为重要。(4)夏威夷式:这是最简单、使用亲属词最少的亲属称谓制。只有两种分类标准:辈分和性别,同辈分、同性别的亲属使用同一称谓。在父母辈中,所有男性亲属的称谓同于生父,所有女性亲属的称谓同于生母,所有表兄弟姐妹或叔伯兄弟姐妹的称呼都与亲兄弟姐妹相同。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可以自行选择父方或母方以决定其隶属关系,也可以同时同双方发生关系。父母任何一方的亲属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这一制度又将核心家庭成员与其他血亲混淆起来,因而核心家庭的地位不显著,淹没于大亲属集团之中。(5)爱斯基摩式:明确地区分核心家庭亲属与其他亲属——在核心家庭内部,亲属称谓是描述性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各有专名;在核心家庭以外,亲属称谓是概括的,父方亲属与母方亲属并无区别,只存在着辈分和性别的区分。

核心家庭占有突出的地位,亲属关系以个人为中心,关系远近取决于感情的联系或经济的原因。例如,在英语中,“uncle”同时适用于父母双方的兄弟以及父母双方姐妹的配偶,“aunt”同时适用于父母双方的姐妹以及父母双方的兄弟的配偶,“cousin”包括所有“uncle”和“aunt”的子女,不分男女,不分平表、交表、堂亲或表亲。(6)苏丹式:流行于从中东到中国的区域,具有高度的描述性,对不同的亲属赋以不同的称谓。采用苏丹式亲属称谓制度的父系社会都具有复杂的政治体制、高度的阶级分化和职业分工(童恩正,1998)。

1.2 亲属词的语义组织:语言学的研究

语言学家也对亲属词研究感兴趣。《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解释词义的著作,产生于秦汉时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在“释亲”中,将我国古代的亲属关系分为宗族、母党、妻党,称为“三党”(王雪燕,2006)。中国古代亲属分类的另一表述是“九族”。“九族说”有古文说和今文说之争。古文说认为,九族仅限于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九代直系亲属。古文说构成了宗法伦理的基础。唐、宋以后,古文说在国家的法律中获得了正式的确认,其中明、清两代的律令规定,九族专指父宗。如《三字经》将亲属分为九族:“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即“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己身、子、孙、曾孙、玄孙”。今文说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今文说满足了封建统治者利用血缘姻亲关系实现对整个社会最大限度控制的需要。封建统治者在赏赐、惩罚、屠杀时是利用九族的今文说的。

当代的语言学家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研究亲属词,简单直观地反映了亲属词词义的共同义位成分。例如,Lounsbury (1964)调查了美洲印第安部落森加纳语言的亲属词,采用语义结构分析法将亲属词分离出4个语义成分:辈分、对象性别、父系/母系、性别。Leech (1974)通过对Njamal语的亲属词进行语义分析,发现了辈分、性别和年龄等语义成分。石安石(1998)发现,英语亲属词有4个语义成分:辈分、近亲/非近亲、姻亲/非姻亲、性别;汉语亲属词则包括了8个语义成分:辈分、

近亲/非近亲、姻亲/非姻亲、姻亲/非姻亲(1对0)、性别(n)、性别(1)、长/幼(1对0)、长/幼(1对2)。贾彦德(1999)分析了63个汉语亲属词,将亲属关系分为三层:一层亲属关系是与个体直接发生联系的亲属,二层亲属关系是经由某个一层亲属关系和自己间接联系的亲属,三层亲属关系则是经由某个二层亲属关系和自己发生间接联系的亲属。每一层亲属关系又区分出配偶、生育、同胞和长幼4种关系,再加上对象性别作为标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亲属词的文化内涵成为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对亲属词的影响、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中亲属词的文化特点、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中亲属词的文化差异等内容。如罗常培(2004)在《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一文中,列举大量事例论证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通过比较汉语与其他民族的语言,研究不同亲属称谓体系的文化差异,将亲属词作为研究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容晨朴(2005)从认知角度比较了汉语和英语的亲属称谓差异,认为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细致繁复,英语亲属称谓系统粗疏简洁,这些差异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

1.3 亲属词的概念组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概念结构,即概念的心理表征,主要涉及概念的构成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关系(张积家,陈俊,2004)。人类的分类行为能够减少环境的复杂性,使人们将周围的事物条理化并帮助人们有效地识别周围客体,减少不必要的学习;还有助于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研究表明,人类头脑中概念组织和词的分类学组织具有较大的差异(Collins & Loftus, 1975)。亲属词反映了人们的分类愿望(Daniel, 1992),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对亲属关系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张积家和陈俊(2001)采用因素分析法考察了汉语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材料是138个汉语亲属词。根据贾彦德(1999)的亲属关系分层理论,一层关系亲属词有13个,二层关系亲属词有43个,三层关系亲属词有51个,四层关系亲属词20个,五层关系亲属词5个,另外加上抚养关系亲属词6个。要求被试采用7点量表评定亲属词的亲密程度,然后进行探索性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汉族大学生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由5个因素构成:(1)远亲:包括与个体有三层关系或三层关系以上的亲属,

如父母的姑、舅、姨等；(2)姻亲：包括妻族和夫族，加上姐夫、妹夫、儿媳、女婿、孙媳妇、孙女婿等；(3)表亲和叔伯亲：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4)近亲属：包括丈夫、妻子、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儿子、女儿，加上两层关系的直系亲属如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孙子、孙女、外孙和外孙女；(5)养亲：包括养父、养母、继父、继母、养子、养女。亲属关系层数和亲密度分数的相关显著， $r=-0.816$ ，亲属关系层数越少，亲属的亲密度越大。亲密度对亲属层数回归显著， $R^2=0.666$ ， $Beta=0.816$ ，表明亲属的亲密度在总体上受亲属层数的影响。当亲属关系层数达到4时，层数的作用就不显著。总之，亲属关系层数能够较好地预言亲属的亲密度，但亲属概念组织与语义学的分类并不完全一致。

近年来，自由分类法在探索亲属词概念结构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要求被试按照自己的标准自由地将事物分成若干类，用分在同一类中的次数作为相似性的指标，得出反映事物相似程度的矩阵。然后，对分类结果采用多维标准法和分层聚类法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概念的语义空间图和聚类树形图，从而直观地反映概念的结构和具体的分类(骆文淑，赵守盈，2005；Pollio, Fagan, Graves, & Levasseur, 2005；赵守盈，吕红云，2010)。张积家等人运用自由分类法对汉族大学生和儿童、纳西族、摩梭人、傣族、彝族、白族和基诺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进行了系列研究。他们采用62个汉语亲属词，10个是近亲：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儿子、女儿、丈夫、妻子；20个是姻亲：岳父、岳母、妻兄、妻弟、妻姐、妻妹、大哥哥、小叔子、大姑姐、小姑子、姐夫、妹夫、嫂子、弟媳、女婿、媳妇、连襟、妯娌、内侄、内侄女；18个是表亲和叔伯亲：伯父、伯母、叔父、婶婶、舅舅、舅母、姨妈、姨父、姑姑、姑父、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8个是二层关系的直系亲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6个是养亲：养父、养母、养子、养女、继父、继母。亲属关系的最高层数为3。将这些亲属词分别写在卡片上，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亲属词分类，并用多维标准法和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亲属词的概念结构体现出

不同的特点。张积家和陈俊(2004)首先运用自然分类法考察汉族大学生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发现汉语亲属词的语义空间存在着“亲属的亲密度”和“姻亲/非姻亲”维度。62个亲属词聚成5大类：(1)近亲；(2)两层关系的直系亲属；(3)养亲；(4)表亲和叔伯亲；(5)姻亲。这一研究证实了先前的因素分析的研究结果。张积家和秀梅(2004)用相同的材料和方法考察了纳西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纳西族被试把62个亲属词聚为6类：(1)父母；(2)与父母同辈的长辈；(3)兄弟姐妹；(4)同辈的姻亲兄弟姐妹；(5)媳妇和女婿；(6)祖父母、子孙、旁系或姻亲子侄。在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出现了“同辈/异辈”和“照顾者/被照顾者”维度，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肖二平、张积家、王娟和林娜(2010)考察了与纳西族同源异流的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具有“亲属的亲密度”和“辈分大小”维度。62个亲属词被分成5类：(1)近亲属、直系亲属祖辈及舅舅；(2)岳父母、继父母、夫妻、养亲及直系亲属孙辈；(3)表亲、叔伯亲同辈和晚辈、姻亲晚辈；(4)同辈和晚辈姻亲；(5)表亲和叔伯亲长辈。张积家、杨晨和崔占玲(2010)考察了傣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在傣族亲属称谓中，特别重视核心家庭，这一特点在傣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两个维度(“婚前的亲属亲密度”和“婚后的亲属亲密度”)中得以体现。傣族人将62个亲属词分为5类：(1)婚前的核心家庭成员；(2)婚后的核心家庭成员；(3)表亲和叔伯亲长辈及同辈；(4)孙辈以及旁系或姻亲子侄；(5)同辈姻亲兄弟姐妹。尽管彝族人和白族人都与古羌人有渊源，且居住地毗邻，交往颇为频繁，但两个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却不相同。王娟，张积家，刘翔，肖二平，和秀梅和卢大克(2012)发现，在彝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亲属关系的性质”和“性别”的维度，在亲属词分类中，彝族被试对近亲、血亲、表亲和叔伯亲、养亲、姻亲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且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界限。彝族人将62个亲属词分为3类：(1)直系亲属、男性叔伯亲长辈、舅舅和养子；(2)男性的表亲、姻亲及养亲；(3)其他女性亲属。这种分类体现了彝族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在白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两个维度分别是“性别”和“亲属关系的性质”维度，62个亲属词被分为2类：(1)男性亲属；(2)

女性亲属。白族的亲属词分类体现了白族“崇阴尚母”的母系文化。崔占玲, 刘烨和张积家(2012)探讨了基诺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 发现基诺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具有“亲属的亲密程度”和“照顾者/被照顾者”维度, 62 个亲属词被分为 4 类: (1)核心家庭成员; (2)较亲密的长辈; (3)较亲密的同辈和子孙辈; (4)关系较远的亲属。各个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和亲属词的具体分类见表 1。

表 1 不同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和亲属词分类比较

被试	亲属词概念结构维度	亲属词分类
汉族(张积家, 陈俊, 2004)	(1)亲属的亲密程度; (2)姻亲/非姻亲	(1)近亲; (2)二层关系的直系亲属; (3)养亲; (4)表亲和叔伯亲; (5)姻亲。
纳西族(张积家, 和秀梅, 2004)	(1)同辈/异辈; (2)照顾者/被照顾者	(1)父母; (2)与父母同辈的长辈; (3)兄弟姐妹; (4)同辈的姻亲兄弟姐妹; (5)媳妇与女婿; (6)祖父母、子孙、旁系或姻亲子侄。
摩梭人(肖二平, 张积家等, 2010)	(1)亲属的亲密程度; (2)辈分大小	(1)近亲、直系亲属祖辈及舅舅; (2)岳父母、继父母、夫妻、养亲及直系亲属孙辈; (3)表亲和叔伯亲同辈和晚辈、姻亲晚辈; (4)同辈和晚辈姻亲; (5)表亲和叔伯亲长辈。
傣族(张积家, 杨晨, 崔占玲, 2010)	(1)婚前的亲密程度; (2)婚后的亲密程度	(1)婚前核心家庭成员; (2)婚后核心家庭成员; (3)表亲与叔伯亲长辈及同辈; (4)孙辈以及旁系或姻亲子侄; (5)同辈姻亲兄弟姐妹。
彝族(王娟, 张积家, 刘翔等, 2012)	(1)亲属关系性质; (2)性别	(1)直系亲属、男性叔伯亲长辈、养子和舅舅; (2)男性的表亲、姻亲及养亲; (3)其他女性亲属。
白族(王娟, 张积家, 刘翔等, 2012)	(1)性别; (2)亲属关系的性质	(1)女性亲属; (2)男性亲属。
基诺族(崔占玲, 刘烨, 张积家, 2012)	(1)亲属的亲密程度; (2)照顾者/被照顾者	(1)核心家庭成员; (2)较亲密的长辈; (3)较亲密的同辈和子孙辈; (4)关系较远的亲属

从表 1 可见, 7 个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总共出现了 6 个维度: (1)亲属的亲密程度: 具有这一维度的民族有汉族、摩梭人和基诺族; (2)亲属关系的性质(或姻亲/非姻亲): 具有这一维度的民族有汉族、彝族和白族; (3)同辈/异辈(或辈分大小): 具有这一维度的民族有纳西族和摩梭人; (4)照顾者/被照顾者: 具有这一维度的民族有纳西族和基诺族, 体现了这两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遗风; (5)性别: 具有这一维度的民族有彝族和白族, 这两个民族分别具有“男尊女卑”和“男女平等”的镜像式的性别文化; (5)婚前的亲属亲密程度; (6)婚后的亲属亲密程度。拥有后两个维度的民族只有傣族。上述维度也是不同民族的亲属词所蕴含的重要的语义成份, 是不同民族的被试对于亲属词分类的标准。它们在不同民族的亲属词分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2 影响亲属词分类的因素

2.1 亲属的亲密程度

亲属的亲密程度首先反映的是亲属之间的血

缘关系, 主要取决于亲缘关系系数(kinship relation coefficient), 即有共同祖先的两个个体中基因相似的比例(Hamilton, 1964)。亲属之间的基因相似比例越高, 亲密程度就越高。亲属的亲密程度还反映了亲属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率的差异(荆其诚, 1990)。如姻亲虽然与个体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但社会交往的频率高, 彼此之间也会亲密无间。可见, 亲属的亲密程度是血缘关系和感情联系的综合体。亲属的亲密程度这一维度出现在汉族人、摩梭人、傣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 是影响这些民族和群体亲属关系认知的重要因素。

汉族是典型的父系社会, 非常重视血缘关系。正如马克思(1889/1965)所说: “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 即合法的继承人, 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的后裔。”在父系社会中, 男性成为家庭的核心, 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成为财产的继承人, 亲属的亲密程度因而就成为决定财产继承人最重要的指标。汉族的传统文化一直主张“亲亲”: 亲属之间的血缘越近, 亲密程度就越高, 在亲属词语义空

间图中的距离就越近。在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也出现了“亲属的亲密度”的维度。在摩梭人心中,母系血亲是第一位的亲属。摩梭人从小就与具有共同母系血缘的成员(如母亲、舅舅、姨妈等)一起生活,这些亲属的亲密度最高;对于生父及其他父系亲属,虽然也具有共同的血缘,但除了少数感情深厚者以外,大多关系冷漠,亲密度不高。因此,在摩梭人对亲属词的分类中,舅舅与直系亲属聚为一类,是最亲密的亲属,体现了摩梭人母系家庭结构的特点。同时,“亲属的亲密度”的维度也体现了在摩梭社会中存在着私有制,具有父系社会的特征,这一结果为确定摩梭母系制并非是原始的母系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傣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的两个维度(“婚前亲属亲密度”和“婚后亲属亲密度”)反映了傣族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特点。傣族平民实行“从妻居”,男子结婚后一般居住在女方家中。傣族男性在婚前和婚后属于两个不同的家庭,处于不同的经济体中。在结婚以前,核心家庭成员与个体共同生活的时间长,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在结婚以后,同一亲属对于个体而言亲密度会发生变化。例如,在婚前的核心家庭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是最亲近的亲属;在婚后的核心家庭中,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岳母、岳父、媳妇、女婿是最亲近的亲属。这一特点体现了傣族人对于亲属共同生活的重视。

2.2 亲属关系性质(姻亲/非姻亲)

根据亲属关系的性质或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亲属分为血亲和姻亲两大类。血亲是相互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姻亲是以婚姻为中介而形成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的性质(姻亲/非姻亲)维度在汉族、彝族和白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尤为重要。

汉族的传统文化重视姻亲在亲属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周易》记载:“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对于个体而言,姻亲既具有选择性,又具有继承性,选择与继承交替进行。上辈人选择的姻亲关系为下代人所继承,人类正是通过这种选择与继承的相互转化而繁衍不息。然而,在汉族文化中,还讲求“内外有别”。

这是因为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不同,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婚姻关系破裂,姻亲关系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姻亲虽然重要,但毕竟与个体没有血缘关系,属于“外戚”,与血亲相比还是处于第二位的。彝族人重视亲属关系的性质。在彝族人心中,层级分明地存在着“血亲”、“表亲和叔伯亲”和“姻亲”的区分。彝族先民创设了独特的父系世系群——“家支”,成为彝族先民血缘群体利益关系的重要协调者。彝族社会有两大突出的特点,一是等级结构,二是家支组织,它们像经纬线,结成一张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网(廖林燕,2011)。因此,森严的等级制度促使亲属关系具有清晰的界限。白族以一夫一妻制的小型家庭为主体,人伦关系比较单一。受妇女文化水平提高、生育政策和现代化发展的影响,白族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这种“小家庭”结构较汉族更为平等和民主,妇女的地位相对较高(彭兆荣,1997)。白族人对于女性的重视使他们对血亲、叔伯亲与表亲的态度没有显著的区别,而对姻亲则不然。唯有婚姻关系确立,才使得个体的生存环境和交际圈发生重要的变化。

2.3 辈分

辈分是语言学家采用语义成分分析法首先从亲属词中分离出来的语义成分,可见辈分在亲属词语义组织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组织并不总是与分类学的语义组织严格一致。汉族传统观念非常重视“论资排辈”。例如,儒家思想中处理亲属关系的核心伦理就是“亲亲尊尊”。《礼记·大传》中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辈分在汉族亲属关系处理中虽然重要,却不敌“亲属的亲密度”和“姻亲/非姻亲”。因为在汉族的亲属关系中,毕竟“亲亲”(包括血亲和姻亲)是第一位的,“尊尊”和“长长”(辈分的体现)是第二位的。当“亲亲”与“尊尊”相冲突时,要服从“亲亲”。在汉族的传统文化中,辈分主要用来协调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协调男性地位尊卑和服从关系的主要依据。在汉族封建家庭中,有嫡庶之分,有长幼之别,有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的区别。因此,汉族人只有在与异辈-同性别的亲属打交道时,辈分的作用才凸显出来;在与异性别的亲属交往时,由于的汉族社会中存在着“男尊女卑”的现象,辈分不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已经为心理学的

实验所证实。张积家和陈俊(2004)让被试判断词对是否是亲属词,发现异辈-同性别的词对(如“哥哥-爸爸”)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同辈-同性别的词对(如“哥哥-弟弟”)、同辈-异性别的词对(如“哥哥-姐姐”)和异辈-异性别的词对(如“哥哥-妈妈”),错误率亦显著高,而其他三类词对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则没有显著的差异。

与汉族不同,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辈分的作用尤为突出。这与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关。首先,在纳西语和摩梭语的亲属词中均有辈分标记。和发源(1995)总结了东巴古籍中出现的亲属词,并按照亲属辈分归纳出21个纳西族基本亲属称谓,发现同一亲属称谓适用于同一类别的成员,属于类别式。纳西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的“同辈/异辈”维度,正是对这种亲属词标记和分类的反映,体现了纳西族的辈分意识。在摩梭语亲属词中,也存在着辈分标记。在和发源(1995)整理的27个摩梭基本亲属称谓中,对同一辈分的人使用同一称谓,如母亲、母亲的姐妹、母亲的兄弟的女阿注,一律称为“阿咪”;对母亲的兄弟、母亲及其姐妹的男阿注,一律称为“阿乌”。对于同辈亲属,又区分长幼,如长于母亲者称“阿咪直”(大妈妈),幼于母亲者称“阿咪吉”(小妈妈)(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2006)。亲属词的类别式特点促使纳西人和摩梭人在亲属词分类时更容易反映辈分的作用。其次,纳西族和摩梭人重视辈分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纳西人以尊老爱幼、父慈子孝、婆媳和睦为美德,平时无论待客、吃饭或闲坐,长者坐尊位;有好吃的也是先孝敬老。在纳西族的乡规民约中,有“不敬长者要受处罚”的条款。同样,在摩梭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是精髓,尊敬长者是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火塘的座位必须辈分分明,尊位一定留给长者,不能乱坐;吃饭要先递给年长者;家里有重大活动一定要先征求年长者的意见等(周华山,2001)。

2.4 性别

与辈分一样,性别在亲属词的语义组织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受汉族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汉族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低下。例如,男性的名字多有辈分标记,女性多无名字,即使有名字,名字中也无辈分标记;汉族的传统文化还要求妇女“三从”:“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礼记·婚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名字中仍然不一定有辈分标记。因此,在对亲属词的分类中,性别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性别的作用要大得多,如彝族和白族在亲属词分类中就更加重视性别的因素。彝族广泛分布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大小凉山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地。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直至解放前夕,彝族社会仍然保留着奴隶制度,存在“男尊女卑”的性别态度,影响着彝族社会的婚姻嫁娶和亲属关系。在彝族社会中,无论在宗教、社会决策,还是在私人领域都存在着“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处从属地位”的原则。彝族传统的毕摩教也强化女性与生育有关的家庭角色,弱化其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角色(徐睿,2007)。这一类现象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有所缓解,但彝族被试在对亲属词分类时仍然将男性亲属和女性亲属截然分开,区别对待,表明在彝族人的心目中,“男尊女卑”的性别态度仍然根深蒂固。

白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的女神信仰历史久远。同时,大理的农耕方式属于坝区生产,便于妇女从事农业劳动。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融汇在一起,使白族的母性文化得到了长期的保持。何志魁(2009)认为,白族的母性文化是摩梭母系文化的延伸和变迁,云南各民族的性别文化是以滇西北的摩梭人为代表的母系制,到大理地区以白族为代表的“重男不轻女”的文化格局,再到滇中和东部地区渐渐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重男轻女”的倾向。白族的母性文化特征在民间文学、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传统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现代白族的家庭结构以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具有家庭规模小、人数少、人际关系简单等特点,母亲在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白族的婚姻还保留了大量的从妻居的习俗。女家凡是缺乏子嗣的(少数有子也招赘),可以为女儿招夫婿,以继承宗业。男子入赘到女家后,一般要随女方姓,其子女也跟女方姓(张锡禄,1984)。正是出于对女性的尊重,“性别”才成为白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重要组织维度。

2.5 婚姻制度与经济生活方式

不同的民族往往有着不同的婚姻制度与经济生活方式,它们也影响对亲属词的分类。例如,摩梭人就有着非常独特的婚姻制度,它既不同于主

流父系社会男娶女为妻的婚姻制度,也不同于原始母系社会女娶男为夫的婚姻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走访制度,俗称“走婚”。这种特殊的走访制度甚至使“婚姻”的概念在摩梭人的社会生活中成为多余。摩梭走访制的最大特点在于走访和家庭分离:建立走访关系的男女各自在母系家庭中劳动和消费,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单位,一般是男方晚上到女方家住宿,次日清晨返回到自己的家中,与母系家庭的成员一起生产与生活。在传统的摩梭家庭中,男不娶,女不嫁,终生生活在母亲的家屋中。摩梭人一般不分家,几代人共同居住,形成了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大家庭,成员一般包括外婆及其兄弟姐妹、母亲及其兄弟姐妹、自己(女性)及兄弟姐妹、子女及姐妹们的子女。传统的摩梭家屋只有祖母(外婆)、母亲、舅舅等母系的成员,没有父系的成员。在摩梭家庭中,女人的身份不是妻子或媳妇,而是母亲或姐妹;男人的身份不是丈夫或父,而是舅舅或兄弟。摩梭家庭没有父亲、妻子、丈夫、女婿、媳妇等角色,也没有父子、父女、夫妻、婆媳、翁婿等父系亲属关系,有效地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矛盾,有利于家庭内部的和睦共处。摩梭人把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作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因而具有很高的亲密度,舅舅也就同直系亲属分在了同一类(肖二平等,2010)。傣族亲属词语义空间的两个维度都属于亲密程度的维度,区别只在于婚前和婚后。它意味着:婚姻关系在傣族的亲属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傣族同胞的婚后从妻居习惯。由于实行从妻居,傣族的男青年在婚前和婚后就隶属于不同的家庭,成为新家庭的成员,加入到一个新的经济和情感的共同体之中。婚姻成为一个人生的界标,将傣族男青年的婚前生活与婚后生活严格区分开来。亲属关系在结婚之后需要重新组织(张积家等,2010)。基诺族的亲属词分类也受婚姻制度影响。基诺族在历史上实行过血缘婚(以同胞兄弟和姐妹之间的结婚为基础的婚姻制度,是最早的家庭形式),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着局部的血缘氏族的内婚制。与之对应,基诺族具有马来亚式的亲属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血缘关系只有五种,且没有性别之分。第一类亲属关系是“我”。在基诺族的语言中,“我”不仅包括“我”自己,也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及其所有的远近、堂表兄弟姊妹;第二类是“我的父母”,包括我的

父母、父母的兄弟姐妹,以及其所有的堂表兄弟姊妹;第三类是“我的祖父母”,包括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及其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姊妹;第四类是“儿女类”,包括我的儿女及其堂表兄弟姊妹;第五类是“孙子女类”,包括我的孙子、孙女及其堂表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这样,任何人的所有可能的亲属都被纳入到这五类亲属关系中,每个人都用相同的称谓称呼与之处于同一类的任何其他人。除了父母有单独的称谓之外,其他都是男女同性称谓(杜宇婷,1982)。因此,在基诺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亲属之间只有亲密程度之分,不会有亲属关系的性质、性别、辈分的区别(崔占玲等,2012)。

2.6 文化观念及其变迁

不同民族的亲属词分类亦受文化观念及其变迁影响。例如,在纳西族和基诺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均具有“照顾者/被照顾者”维度,就是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纳西族人把儒、道、佛、藏传教的精华融于本民族的东巴教,形成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独特民族精神,即“天然的人道主义”。纳西人重视家庭的和睦、稳定,对待儿童和老人,无论亲疏远近,均能够很好地对待和照顾,决不因为亲属关系远近而厚此薄彼。基诺族人世代生活在森林深处,几乎与世隔绝。他们彼此之间团结友爱,民风淳朴善良,崇尚尊老爱幼、父慈子孝。这些传统习俗,仍然被保留并延续至今。但是,少数民族的亲属词分类亦可能受急速的文化变迁影响。例如,虽然父亲并不生活在摩梭家庭中,摩梭人在传统上虽然不是不知父,但不亲父却是事实。由于泸沽湖地区的旅游开发和汉文化冲击,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增多,摩梭人便将父亲、爷爷、奶奶划在“近亲、直系亲属祖辈和舅舅”一类中。基诺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之中,语言中的大多数词汇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概念,句子结构非常简单,无法表达复杂的思想。基诺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学生学习全部使用汉语文编写的教材,学校教育处处体现出汉文化的特点。基诺族后代自接受学校教育开始,便完全置身于汉文化的熏陶中,伴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学生的思维模式慢慢就会体现出汉文化的特点。韩忠太和彭多毅(1995)发现,与中、老年的基诺人不同,基诺族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与汉族青少年

更加相似,这是汉文化对基诺族长期影响的结果。在汉文化的影响之下,基诺族学生熟悉了汉族的亲属称谓,在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出现“亲属亲密程度”维度也就不足为奇。因此,基诺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的“亲属的亲密程度”维度可能是文化变迁的结果。

2.7 情境

大量的研究表明,情境影响人对于事物的分类。解释理论认为,概念结构包括两个部分:(1)由概念的情境独立的特征组成、反映类别本质的核心部分,这些特征或者属于事物的诊断性特征(如鸟类的“有羽毛”),或者与人类有典型的互动(如咖啡是“可以喝的”),能够在任意情境下激活概念。(2)由概念的情景依赖的特征组成、在特定情境下影响类别成员身份的非本质部分,这些特征仅在特定的情境下进入工作记忆获得激活(Barsalou, 1982; Medin & Shoben, 1988)。张积家、陈俊和莫雷(2006)提出的社会概念分类的权变模型认为,分类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事物特征、知识经验和分类情境。分类情境包括分类的宏观情境和微观情境。微观情境是指分类时的具体情境,如物理情境和语境。宏观情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主体思想,它概括了一定时期的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张积家等新近的研究表明,人生礼仪情境(满月酒、婚礼和葬礼)对汉族和摩梭人的亲属分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三种不同的人生礼仪情境下,汉族人和摩梭人对亲属词的分类不同。

2.8 年龄

个体的心理发展是社会化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对于亲属关系的认知也在深化,亲属词的概念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最终形成了本民族成人对亲属关系的认知。张积家和李斐(2007)考察了汉族儿童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发展。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汉族儿童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也在变化。在亲属词的概念结构中,小学低年级学生出现了“性别”和“辈分”的维度,小学高年级学生出现了“辈分”和“成人/儿童”的维度,初中生出现了“亲属亲密程度”的维度,高二学生出现了“姻亲/非姻亲”的维度。与不同民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可以发现,汉族儿童的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发展和人类亲属词概念结构的进化颇有类似之处。

3 民族语言对亲属关系认知的影响:综合的观点

语言是社会的镜子。语言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现实社会的特点,也反映了该民族社会历史的特点,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既是思维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移植的过程。列维-斯特劳(C. Lévi-Straus)认为,亲属关系不仅需要靠生物学关系来维持,而且需要靠语言的反复使用加以巩固。亲属称谓规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和态度规范,同时包含了个人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亲属语词不仅是某种社会学的存在,而且也是说话的因素”,使用这些语词就等于“做”这些语词规定的关系规则(列维-斯特劳, 1958/2006)。个体在使用亲属词时,也隐含着实行由亲属关系要求的不同态度,如尊敬或亲近、权利或义务、亲情或敌意等。对于同一亲属,讲不同语言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些蕴含在语词意义中的亲属之间不同态度的因素,在保障亲属关系维持和运作上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使亲属群体具有凝聚力、稳固性和均衡性。民族语言如何影响不同民族对于亲属关系的认知?民族语言又如何影响不同民族的心理?

3.1 亲属词影响亲属关系认知的机制

亲属词影响亲属关系认知的机制主要有三:(1)通过语言标记影响亲属关系认知。在语言中,某些成分比其他成分更为基本、更为常见,被称为有标记的(理查兹, 2000)。语言标记的存在使得某些认知途径、过程和策略更容易被选择。不同民族的语言对于亲属关系作不同的区分,具有不同的标记。例如,纳西语亲属词和摩梭语亲属词均标记亲属辈分,同一亲属称谓适用于同一辈分的亲属,体现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上,辈分大小就成为主要维度。又如,在傣族亲属称谓中,自我的下二代与旁系的下一代称谓相同。长辈对于晚辈的称呼除了儿女以外,侄、内侄、外甥、孙子、外孙等一律都称做“澜”,“澜”后面加“映”表示女性,加“再”表示男性,即“辈分斜行”。由于这一特点,傣族人就将孙辈以及旁系或姻亲的子侄分在了同一类中。(2)通过知觉类别效应影响亲属关系认知。知觉类别效应(perception categorical effects)是通过某种机制将连续的物理

维度划分为不连续的区域(Livingston, Andrews, & Harnad, 1998)。概念影响知觉,如果一对刺激来自于同一类别,就难以区分;如果来自于不同的类别,则易于辨别。不同的事物如被贴上了相同的标签,人们更容易等同地对它们。Goldstone (1994)认为,分类学习会导致人们对分类的维度敏感化,类别一旦被划分,类别内就会产生紧缩效应,缩小或忽略类别内成员的差异;类别间就会产生扩展效应,扩大类别间成员的差异。不同民族的语言对于亲属的区分不同,会使人们对于本民族语言中的分类维度更加敏感,对于本民族语言中没有的分类维度不敏感。例如,摩梭语亲属词以母系亲属称谓为主,父系血亲及姻亲的称谓数量很少,大多用母系亲属称谓的叙述式的方式表达(詹承绪等, 2006)。因此,摩梭人对“姻亲/非姻亲”这一区分就不敏感。(3)通过理论和语境影响认知。解释理论认为,人们根据自己关于客观世界的看法或者理论来组织概念,创造某个概念并非是提出一堆独立的特征,而是提出关于某个事物结果的理论,是理论使得特征变得相关。人们以理论或对本质属性的信念来称呼或归类物体,特征关系只是理论的副产品,理论构成了概念的本质(Medin, Lynch, Coley, & Arans, 1997)。文化语境可以提供概念里特征之间的连接和类别里概念之间的连接,使概念和类别联系起来是人们关于目标的知识。个体以事物特征和知识经验相结合的方式建构分类系统。不同民族之间亲属词概念结构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思维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2 民族语言影响民族心理

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是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对语言和认知的关系,存在着语言普遍论(Linguistic universal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的争论。语言普遍论认为,思维是普遍的,人们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进行交流,语言差异并不影响思维的一致性;语言相对论则认为,文化通过语言影响思维,影响人们对经验的分类,语言的差异将会导致思维的差异。沃尔夫(Whorf)认为,语言决定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学习一种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语言有不同的决定认知的方式。语言结构有

无限的多样性,一种语言系统中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它语言系统中编定的范畴类别和区分定义不同。这就是语言关联性假设(Carrol, 1956; 张积家, 刘丽虹, 谭力海, 2005)。近年来,来自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给语言关联性假设提供了大量证据,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

语言的最典型的特征是可整合性:一旦人们掌握了词义和把词组合成句子的规则,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整合以创造出新的意义表征。因此,语言使人形成了整体表征,从而超越了核心知识系统的缺陷。研究表明,人类和动物都具有核心知识系统用以表征事物的特性,但核心知识系统是相互独立,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够把这些来自不同系统的信息整合起来(Hermer, Spelke, & Katsnelson, 1999; 刘丽虹, 张积家, 2009)。语言为人类提供了整合知识的工具,在认知中起到中介的作用,因而对人类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观不同民族亲属词分类的研究结果,民族语言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民族语言影响个体对亲属关系的认知方式。不同民族在语言表征上的差异往往会限制个体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信息。例如,在亲属词表征上,“妈妈的姐妹”在汉语中谓之“姨”,在摩梭语中却与妈妈共享一个称呼“阿咪”,在英语中则与爸爸的姐妹等一起称为“aunt”。同一个亲属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的使用具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认知加工时的模式必然存在差异。(2)民族语言影响个体对亲属关系的认知途径。语言中词语的多样性和任意性表明,在不同语言中存在程度不同的语义缺乏现象。例如,在摩梭语亲属称谓中,凡属于与父亲同辈分的男性亲属(姨父、姑父、岳父、舅舅等)的称谓是统一的,一律称“阿乌”;傣族人对侄子、内侄、外甥与孙子使用同一称谓,对侄女、内侄女、外甥女与孙女使用同一称谓;与汉语的多样化的、精细化的称谓方式比,摩梭语和傣语的概括的语言特点使得摩梭人和傣族人在进行语义提取时有着与汉族人不同的认知途径,从而体现出认知过程的差异。(3)民族语言影响个体对亲属关系的认知策略。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词汇形式和语法结构,这会导致语言使用者在加工语言时使用不同的策略。例如,在汉语中,凡属于妻

族的亲属称谓往往加上“内”的标记,如“内侄”、“内侄女”、“内兄”、“内弟”、“内姐”、“内妹”等;对母族、姐妹和女儿的子孙的亲属称谓和往往加上“外”的标记,如“外公”、“外婆”、“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在摩梭语中,凡属带“咪”的亲属词一般都是女性亲属,如“阿咪”(妈妈)、“各咪”(妹妹)、“则咪”(甥女)、“如咪”(孙女)等。这种语言特点容易在个体的记忆表征中凸显出来,从而使得汉族人和摩梭人在加工亲属词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因而采取相应的认知策略。(4)民族语言影响个体对亲属关系认知的难易。讲不同语言的人在进行亲属的某些性质认知时会有难易区别。例如,不同民族语言对亲属词的区分性不同,势必会影响人们对亲属关系认知的难易程度。例如,汉语亲属词区分父系与母系,父之父为爷,父之兄为伯,父之弟为叔,而在纳西族和摩梭人的亲属词中却没有这种区分,因而在认知亲属的父系或母系特征时会有困难。(5)民族语言影响个体对亲属关系的认知结果。不同语言中的范畴和原型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加工、编码和储存,使讲不同语言的人得到不同的认知结果。在摩梭语亲属称谓中,“阿乌”(舅舅)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意义,舅舅在摩梭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使之在亲属类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父亲”的作用则次要得多。因此,摩梭人对舅甥关系的认知必定会不同于其他民族。

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民族在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上的差异,集中体现在语言上。不同民族的祖先根据自己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语言一旦产生,就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认知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们在认知过程和心理特点上具有独特性,以区别于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因此,语言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形成的基础。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影响了人们对亲属词的认知表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揭示民族语言对不同民族个体亲属关系认知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为民族心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资料。今后,应该加强对亲属关系认知的实验研究,特别是加强认知神经科学的范式(如脑电和脑成像技术)的研究,以便得到更为精确和新奇的发现。

参考文献

- 崔占玲,刘烨,张积家.(2012).基诺族中学生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及其成因.《心理科学》,发表中.
- 杜宇亭.(1982).从基诺族的调查探索血缘家庭遗迹.《世界历史》,(5),43-47.
- 恩格斯.(1884/197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北京:人民出版社.
- 韩忠太,彭多毅.(1995).汉文化对基诺族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6),73-78.
- 和发源.(1995).纳西族的婚姻家庭与亲属称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38-44.
- 何志魁.(2009).互补与和谐:白族母性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贾彦德.(1999).《汉语语义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荆其诚.(1990).《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北京:人民出版社.
- 廖林燕.(2011).论彝族政治权利的历史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2),99-104.
- 列维-斯特劳斯.(1958/2006).《结构人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丽虹,张积家.(2009).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自然辩证法通讯》,31,22-27.
- 罗常培.(2004).《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
- 罗维.(1987).《初民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时间 1920)
- 骆文淑,赵守盈.(2005).多维尺度法及其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应用.《中国考试(研究版)》,(4),27-30.
- 理查兹.(2000).《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马克思.(1889/1965).《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北京:人民出版社.
- 摩尔根.(1995).《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时间 1877)
- 彭兆荣.(1997).《西南舅权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容晨朴.(2005).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汉英称谓语的差异.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
- 石安石.(1998).《语义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童恩正.(1998).《人类与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
- 王娟,张积家,刘翔,肖二平,和秀梅,卢大克.(2012).彝族人、白族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一兼与摩梭人的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5-54.
- 王雪燕.(2006).《尔雅·释亲》的文化考释.《前沿》,(5),231-233.
- 肖二平,张积家,王娟,林娜.(2010).摩梭人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和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42,955-969.
- 徐睿.(2007).宗教与性别社会化——毕摩教在凉山彝族女性生命转折点中的作用.《云南社会科学》,(3),84-88.
- 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2006).《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积家,陈俊.(2001).大学生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社会心理研究》,(4),25-30.
- 张积家,陈俊.(2004).汉语亲属词概念结构再探.《语言科学》,3,77-86.
- 张积家,陈俊,莫雷.(2006).年龄和知识学习对国家分类的影响.《心理学探新》,(2),38-43.
- 张积家,和秀梅.(2004).纳西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兼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比较.《心理学报》,36,654-662.

- 张积家, 李斐. (2007). 汉族儿童亲属词概念结构发展研究. *应用心理学*, (1), 55–60.
- 张积家, 刘丽虹, 谭力海. (2005). 语言关联性假设的研究进展——新的证据与看法. *语言科学*, 4(3), 42–56.
- 张积家, 杨晨, 崔占玲. (2010). 傣族亲属词的概念结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41–48.
- 张锡禄. (1984). 试论白族婚姻制度的演变——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一百周年. *下关师专学报*, (3), 29–37.
- 赵守盈, 吕红云. (2010). 多维尺度分析技术的特点及几个基础问题. *中国考试*, (4), 13–19.
- 周华山. (2010). 无父无夫的国度? ——重女不轻男的母亲摩梭 (第二版).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 Barsalou, L. (1982). Context-independent and context-dependent information in concepts. *Memory and cognition*, 10, 82–93.
- Carrol, J. B.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llins, A. M., & Loftus, E. F. A. (1975). Spreading 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2, 407–42.
- Daniel, R. G. (1992). *Discovering anthropology*.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 Goldstone, R. L. (1994). Influences of categorization on perceptual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23, 178–200.
- Hamilton, W. D. (1964). The genetical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52.
- Hermer, V. L., Spelke, E. S., & Katsnelson, A. (1999). Sources of flexibility in human cognition: Dual-task studies of space and language. *Cognitive Psychology*, 39, 3–36.
- Kroeber, A. L. (1909). Classificatory systems of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9, 77–84.
- Leech, G. (1974).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London: Penguin.
- Livingston, K. R., Andrews, J. K., & Harnad, S. (1998). Categorical perception effects induced by category lear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4, 732–753.
- Lounsbury, F. G. (1964).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kinship semantics. In H. G. Lunt (Ed.), *Processing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Mouton: The Hague.
- Medin, D. L., Lynch, E. B., Coley, J. D., & Arans, S. (1997). Categorization and reasoning among tree experts: Do all roads lead to Rome? *Cognitive Psychology*, 32, 49–96.
- Medin, D. L., & Shoben, E. J. (1988). Context and structure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20, 158–190.
- Murdock, G. P. (1949).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Macmillan.
- Pollio, H. R., Fagan, L. B., Graves, T. R., & Levasseur, P. (2005). The semantics of space: Experiential and linguistic aspects of selected English spatial term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34, 133–152.

National Language Influences National Psychology: Evidence from Classifying Kinship Words

XIAO Er-Ping^{1,2}; ZHANG Ji-Jia²

(¹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²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pplic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kinship,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initial social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blood relationship and marriage. There are corresponding words to represent kinship in every language, which is called kinship words. Kinship words contain abundant information involving genetics, marriage, sociology and culture. Kinship words, the royal crown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nymic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ethnonymics and linguistics, especially national psychology. Since 2001, by means of natural classifying, we explored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kinship words among varied participant groups, including children, youngsters and undergraduat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such as the Han nationality, the Naxi nationality, the Moso, the Dai nationality, the Yi nationality, the Bai nationality and Jinuo nationality.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kinship words varie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e series studies reveal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and conceptual organization, demonstrating that national language influenced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revealed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kinship words classifying, providing important evidences for the theories on the influences of language on cognition; and revealed the features of th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kinship, providing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national psychology.

Key words: kinship words; conceptual structure; national language; national mind